

我就是一個商人，我很喜歡我的現在。政治，關我屁事！

蔣友柏：我是蔣氏第一代



我的曾祖父 蔣介石

我就是一個商人，我很喜歡我的現在。政治，關我屁事！

蔣介石先生也許永遠無法想像自己苦心制訂的「反攻大陸計劃」會以這種方式來實現——他的曾孫友柏今年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公司名為「常態」的設計公司。

這是蔣友柏在台北的公司裏向《南方人物週刊》雜誌透露的。

也許過不了多久，我們就能看到蔣介石的曾孫出現在上海的時尚圈中。這個說法會讓蔣友柏感到相當不舒服，他堅信：“今天我當後代，如果還要用前輩幫你種的樹來納涼，你就沒資格姓這個姓。”

懸崖上的貴族

12年前，他會曾陪同病重的父親蔣孝勇回浙江奉化老家祭祖，這是他截至今年唯一一次踏上對岸的土地，儘管他的曾祖父在這片土地上曾統治了漫長的歲月。

歷史總是充滿了各種吊詭。蔣友柏說：“人在人前，”在他的成長歲月中，當然有祖產可繼承，可也從來沒過多久，他的朋友就跑去過來說蔣友柏視和蔣友柏說：“因為你是‘蔣匪’、‘蔣賊’的後代。”

剛去加拿大蒙特利爾讀書時，因為語言不通，蔣友柏無法打“主流團體”。第二年，班上來了一個大陸的同學，兩個人立刻成為了朋友。然而沒過多久，他的朋友就跑去過來說蔣友柏視和蔣友柏說：“因為你是‘蔣匪’、‘蔣賊’的後代。”

往事與現實的對比總是讓人唏噓不已。當年的朋友、鄰居都可能背叛你，而曾經不共戴天的敵人今天也可能會把你拍馬。曾經身處最高峰的蔣友柏用了很短的時間就體會到了人世間的無常——

“2001年我回到台灣到現在，除了那些一看就知道是屬於那種‘我無法與他溝通的’人之外，我再也沒有聽過有人稱我為曾祖父、蔣公；就連那些當年靠黨權、蔣總統威風、‘三民主義統一中國’等通關密語而升官位，後來轉型當黨媒或政壇名嘴的愛國愛黨中堅分子，大部分的時候，我也聽到他們稱呼我為曾祖父與曾祖父的名號也只是‘老蔣’與‘小蔣’。‘蔣國先生’這個稱呼偶爾有出現過，但‘蔣公’我是真的沒再聽過了。但是，自從大陸落格(博)開業以來，來自中國大陸的網友，在他們的留言裏卻幾乎都稱呼我為曾祖父、蔣公，而且還稱他為中國近代史裏毛澤東一樣偉大的‘偉人’；所以當我20年前再次聽到‘蔣公’這個稱呼，是來自一群當年曾喊我為‘蔣匪’、‘蔣賊’的人的後代嘴裏時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到底是這個世界瘋了，還是這個世界想讓我發瘋。”

蔣友柏也有讓人發瘋的時候，他直言“蔣也有做錯的時候”，

愛的孫子。也許是看透了政治的爾虞我詐，也許是避艱親愛“蔣家人不能再碰政治”的遺言，1988年，蔣經國去世後，蔣孝勇立即攜妻帶子遠赴加拿大蒙特利爾定居。隨後為了子女的教育，一家人又遷移到了美國舊金山。從雲端驟然墜落人間的感覺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體驗到的，但不論是在蒙特利爾還是在舊金山，蔣友柏都能感覺到身份大變後的窘迫——

“在這裏(舊金山)我認識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，他平常很低調，但家裏非常‘富有’，零用錢超級多，住的房子超大，而且買房子的錢是用現金一次付清，後來從其他來自中國的朋友那邊知道，他是‘高幹子弟’；有一次，我買的好萊蕪，一樣是‘高幹子弟’，怎麼我這個來自台灣的‘高幹子弟’和那個來自中國的‘高幹子弟’差別那麼大。我已經好久沒有去美國了，但最近有一個朋友在洛杉磯，跟他聊天時，他談到在洛杉磯地區Arcadia，San Marino這兩個高級住宅區，幾乎有一半的新買主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，而且都是現金交易，一次付清；而他之前從Montreal的觀察與經驗裏有一種認知，大陸出來的中國人都比較窮；後來在舊金山看到的，和現在聽到的，把我原先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完全打破，真正口袋有大筆現金的，原來都是中國出來的所謂‘官商子弟’。”

在紐約大學讀書時，他和弟弟友常會帶著去曼哈頓上東街看對曾祖母宋美齡——一個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。

在友柏眼裏，曾祖母就是那個始終穿得整齊，令人尊敬的姑娘。在她晚年的時候，他與兄弟會用國語、英語、上海話、粵語話和他交談。宋美齡甚至會指著這位帥氣的曾孫叫他這女孩子。她還會看蔣友柏硬著頭皮交上来的英文作業，給他改上無數的紅叉又寫。

蔣友柏的英文名Demos就是宋美齡給取的，語出希臘文，意思是“人民”。

每年到宋美齡生日，一家人都會到紐約去祝壽。那時宋美齡已步入晚年，友柏已長成一米八幾的青年，但見到曾祖母還是把把抱。在一旁的母親蔣方智怡連忙制止，她怕兒子無禮頭頂用力會傷害宋美齡，畢竟那是已年近百歲。

但宋美齡卻笑著叫到：“沒關係，抱緊緊才好，越緊越好。”

更早些時候，他還記得與蔣經國先生一起吃飯的時光：每週四下午，是友柏、友常兄弟兄弟的family day。

這是外界難以想象的，蔣家人的家庭聚餐會帶有強烈的軍事化色彩：一、大人發動椅子之前，不能先動椅子；二、吃菜的時候，不能講話；三、在餐後吃東西時，手不能放在桌上；四、一定要把自己碗裏的菜吃完；五、用完餐，要把空碗放在盤子上，離開前必須得到允許，說我吃完了；六、等大人說可以之後，才能在說完大家慢慢後離開。

蔣孝勇是這麼要求兒子的，他的父親蔣經國也是這麼要求他的，而蔣介石也是如此要求兒子蔣經國的。這種嚴格的宗教教育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中，採訪完後，他會很客氣地遞一封郵件，開頭則是Dear Sir(尊敬的先生)。在眾人眼中嚴厲又專制的蔣經國，在蔣友柏看來並沒有什麼神祕的，那個老人就是他的家人。有著這樣的生人體驗，要讓他去去“蔣”這個符號帶給他的影響是不可能的。

2003年7月，台北中山醫院大門口擠滿了SNG車，記者們準備連線報導。這一天的蔣友柏爸爸說了他的女兒出生。他始終擺脫不了外界對他的關注，就因為他姓“蔣”。

另類的台灣政治觀察者

蔣家兩代長期執政政府，不論過去，也和台灣過去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，而他也一直在那兒。人人在談著千絲萬縷的關係：連戰是蔣友柏大伯蔣孝文的“伴讀”；他的堂姐蔣友梅結婚時，代表女方家長的就是連戰，不論是蔣友柏生女還是出書，連戰都親自站崗；每逢蔣

經國忌日，馬英九都會去墳前長跪哀思，馬的紅包也是蔣友良生前惟一肯接受的……

甚至令宋楚瑜在2000年“總統”選舉中落敗最重要的“興票案”(編者按：1999年12月9日，已逐漸露出白頭面目的李登輝拋出“興票案”，全力清剿宋楚瑜。受該事件影響，原先民調顯示一直處於上風的宋楚瑜選情急轉直下，“清廉形象”崩潰，最終以微弱劣勢敗北)，都是因為蔣家——國民黨專門批出一筆錢來照顧蔣家後人。

蔣友柏卻似乎無視這些交往，他的表態是——我不藍不綠，為什麼“蔣”這個姓就一定要被歸到藍營；假如可以這樣歸類，那是不姓“宋”的，還要堅持反清復明；而姓“蔣”的可以堅持說台灣不是“中華民國”，也不是台灣國，而是東亞王國。

2004年，他幫助無黨籍立委候選人吳祥輝設計競選產品，而吳素以吳奇彩色和此蔣言論著稱。蔣友柏的解釋是：“他相信設計來提升選舉文化，這個概念吸引吸引了我！”在他看來這只是生意上的合作，無關政治。但是他也要向媽媽解釋：我沒有借用“蔣”這個姓來接生意，同樣也不會因為這個姓而去推掉生意。

有一次他與一位堅定的台灣信仰者聊天，對方和他說：“友柏，‘二二八’事件已經過去60年了，‘二二八’已經無平了大量的傷痕，對於那個事件的受害者他們的家屬而言，也都已經慢慢能夠接受了，還欠缺的那一部分誠心的道歉，假如你能做那件事情當然對他們的情緒會很有幫助；但是假如你硬要做的話，去彌補你曾祖父所犯的錯什麼，最需要你幫忙的是那一批跟著你曾祖父離開到台灣，回不了家，在台灣孤身一人沒有結婚也沒有後代的那些老兵們。”

並介紹他去看一個相關的網站。看著逐漸迫近自己先輩老兵的老兵的落淚慘狀，蔣友柏在電腦前一直待到第二天的早上，陪伴他的是“淚水”。

他追問：“這是歷史的悲劇，就像你的家庭創造一個自己都不動的石頭上，那顆自己五星上蔣的曾祖父在那個歷史當口也無能為力，我作為後代除了除了一絲歉意，我又能做什麼？我會祖父把他們從大陸帶到台灣，黨賊他們‘反攻大陸’，但是我曾祖父與祖國相繼過世之後，這個‘回家’的夢也只能用‘開放返鄉探親’來彌補，而喚不回的是一群‘人花’在‘空等待’上的青春；如今，他們的靈魂飄不回去他們的原鄉，又感覺到被這塊‘新故鄉’的土地排斥而無法流為安妥，那一個一個的孤軍的靈魂繼續飄浮在台灣的上空。我會祖父、祖父的‘暫居’好像是他們自己事先就安排好的，這樣他們兩個一起在台灣的半空中陪伴他們，一起飄浮。”

在加拿大讀書時，老師教義課不像台灣那樣會灌輸很多意識形態的東西，而是要讓學生在一個大歷史的角度去想問題，比如：美國南北戰爭中，如果南軍獲勝，那今天美國經濟會是什麼樣子？

今天的蔣友柏看台灣政治經常會有“宏論”而他自己卻當當的死忠支持者會罵他一切都會當當說：“只是‘一個’‘小’生意。他會去去‘義賣’‘國貨’，但因為那是保護他他那樣去做而已。”

夙許諾的早年

1996年，父親去世後，在蔣友柏的晚年時刻裏，蔣友柏發現學校已經不能滿足自己，他切斷了在紐約大學的學業，開始了自己關門大吉。

如果蔣孝勇不是在48歲的年紀就英年早逝，蔣友柏的人生“應該”是另外的一種風景：他“應該”去父親的公司實習、上班，父親“應該”會介紹很多人和他認識，“應該”會有很多人找他來談未來的計劃。這一切都在1996年夏天突然了，蔣友柏當然會有很多很厲害的關係，但他也一直在說：“人人在談，”他以為去去做、去做傳統的生意，“蔣”這個招牌是可以打的。但他選擇了設計業，他說：“我沒法選擇我的身世背景，但我可以先斷了所有可利用的資源。”這讓外

界都大為吃驚，也讓人們注意到這個外表英俊的蔣氏後人。

當年他也就是執約子弟。19歲時在紐約做房地產生意賺得第一筆160萬美元的儲蓄金然後他努力靠做期貨賺錢，可也揮霍無度。中學同學來看他，豪氣的直接拍他回機票接同學，帶著兄弟們去吃米其林推薦(米其林是歷史悠久的專門評點餐飲業的法國權威鑑定機構，其出版的專供選擇餐廳的指南，即《米其林紅色寶典》被美食家奉為至寶)的法國大餐，只要覺得紅酒不錯，來個五六瓶是非常正常的。

一次和朋友約在紐約最熱門的酒吧Chaos見面，朋友先到卻無法進去，蔣友柏到了以後和門口保鏢握手就帶著朋友們進去了。

這個時候他對母親說：“No news is good news!”(沒事發生就是好事)為什麼還要回台灣呢？他給的第一個解釋是這裏沒有挑戰，看一看已經“換了天地”的台灣會如何對他這個另類蔣氏後人。再有就是碰到了老婆，接觸蔣友柏，會發現他是一個彬彬有禮有教養的人，可這樣一副外表卻掩蓋著一顆叛逆的心。

初回台灣，他不去做蔣經國就熱的投資銀行，而是和老妻做(當時的女朋友)跑到西門町去過一個月兩南新台幣的日子。他說：“我把自己降到最低，看看可不可以活，倘若可以的話，我再試著爬到最高階，然後看看在這之間會不會找到方向。”

在西門町的8個月，蔣友柏有兩個感悟：一是可以看到自己到底有甚麼本事；二是要有“本事”，也就是說要有好的本錢才能做事。

我是下午兩點鐘下班的商人

他看台灣人喜歡穿名牌，連一件T恤都要名牌，其實這是一種無聊的炫耀。一般人會想“穿什麼樣的衣服才能代表自己”，蔣友柏認為：“當你在意外表時，什麼都沒用。”

創業之初，蔣友柏兄弟的“橙果”就吸引了台灣人眼球——又是兄弟，不從從從，做的又是流行的“設計”，又加上當時有一個國際級的設計大師Michael Young加入，這樣的六國籍籍三角的關係，嚴然大展“橙果”一成立就好像是一個國際級的設計公司，其實這家公司註冊資本才500萬新台幣。

媒體的誇耀加上Michael Young的臉面和經驗，公司在前半年很是風光，無論什麼公司，蔣友柏的一個電話就可以讓“具有決策權的高層”談設計、談合作、談合約，而且他的會談會談一些著名公司的設計合約。但是，光簽了合約，卻交不出客戶認為有價值的成果，是拿不到客戶白銀的。

蔣友柏開始頭大，因為他開始去在“付款的客戶”和偉大的“藝術設計指導”之間——“付款的客戶”在沒有辦法交付的時候會很恨地罵他，他永遠是那一個得去面對客戶指怒的人；而另一方面，回到公司後，得到的答案永遠是“客戶不滿意所以我們要我們的設計服務，公司提出的設計概念又永遠是一套‘這’‘那’‘城市’‘一套’‘倫敦’式的“藝術”的詮釋權。

“更糟糕的是，這兩套歐美式”的設計，永遠沒有辦法在“台灣式”的工廠裏，順利地把產品設計從圖紙轉化到模具再轉化到大量生產，這樣的結果就是永遠都收不到客戶的付款費用。”

在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個月後，蔣友柏開始採取主動：把整個公司的經營主權重新拿回：既然認清理想客戶只是不可多求的好事，為了公司的生存，那就什麼樣客戶都接。“美”、“藝術”、“得設計”不是標準，客戶的獲利以及“能讓客戶的品牌與產品增加附加價值和提升實相”，才是衡量設計投資回報率的唯一檢驗標準。

外表的風光並不能掩飾公司內部的連環的失敗。在很長的時間裏，公司的財務完全不能平衡。

蔣友柏的手下拿著財務報表建議必須開掉Michael Young這位設計大師，這讓蔣友柏立刻抓狂。公司倒閉時，他連續打了6個月的圖



經就已經是兒女雙全，會經姐姐無暇的蔣友柏現在很乖地兩點下班收工回家。

只是，他會早上6點上班，而且晚上等妻兒上床後，他還會打開電腦進行投資銀行業務。

他帶兒子去過中正紀念堂(現台灣民主紀念館)，卻笑稱是帶兒子去喂鴨子(廣場有大量白鴨子)。

他也常買一杯咖啡，到中正紀念堂階座上，有時坐兩三個小時去想想前次當年的故事。

他說：“我不喜歡人家稱我為‘蔣家第四代’，我喜歡當我自己的‘蔣家第一代’。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，我寧願拋棄那‘第四代’殘留的政治貴族權利，從零開始去開創屬於我自己的新天地。”

攝影師在給他拍照的時候，我向他求了一個個面，有媒體說現在台灣的兩蔣父子是他設計的。哈哈的蔣友柏突然間嚴肅起來：“他們是我的先人，我怎麼可能這樣做！”這一刻，我們相信，蔣氏的血液正在他身體流動。

作者：張歌 譯者：《南方人物週刊》